



# 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

##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发展

周励恒

**摘要:**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史学要论》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初期,《历史哲学教程》问世于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后的抗战初期。由于写作时代背景的不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认识的差异,两部著作具有不同的面貌和特点。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史学要论》;《历史哲学教程》;李大钊;翦伯赞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1.05.006

**收稿日期:**2021-04-14

**作者简介:**周励恒,男,北京人,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外学术交流史,E-mail: zhlh91@sina.com。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均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史学理论既包含对历史本体的理论认识(狭义的历史理论),也包含对历史学的理论总结(狭义的史学理论),借用西方历史哲学的分类,前者带有思辨的历史哲学特点,后者具有分析的历史哲学色彩。《史学要论》出版于1924年;《历史哲学教程》问世于1938年,并在次年再版。它们在内容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初步发展阶段两个里程碑,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奠基到充实、从学理阐释到参与社会改造的进展。

### 一 产生背景:传播与运用

李大钊《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期诞生的。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先驱。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时就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对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青春中国”的重要意义,非常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献。此后,他又相继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李大钊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最积极、最有成就的学者<sup>①</sup>。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综合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论述,对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做出归纳: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都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关系密切,社会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社会组织要与社会生产力相匹配。除了发表论文,自1920年至1925年,李大钊

<sup>①</sup>除李大钊外,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主要有: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李荫清《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史地丛刊》(北京)1920年第1期;刘叔琴《唯物史观在历史哲学上的价值》,《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期;高一涵《唯物史观的详释》,《北大社会科学季刊》1924年第2卷第4期。

还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史”等课程,并在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等作过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概论方面的学术报告,其中以在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思想史”课程内容最为丰富。他以时间顺序讲授欧洲重要思想家波丹、鲁雷、孟德斯鸠、维柯、马克思及李凯尔特的史学思想,论述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揭示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必然性,这些都为他写作《史学要论》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的构建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说,“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并非常感谢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sup>①</sup>。同时,他还注意采纳其他国外史学思想的有益成分。《史学要论》提到的西方思想家、史学家有 30 多位,这与李大钊开设“史学思想史”很有关系。对从中世纪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谷灵蒲《文化系统及历史》,到启蒙运动后的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维柯和 19 世纪的黑格尔、翁特,以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西南学派的著作,《史学要论》都有精要的萃取和点评。在论述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价值时,李大钊参考了日本内田银藏、德国兰普勒希特、英国弗林特、美国房龙等外国学者的相关理论,并做出了创造性的阐发<sup>②</sup>。

20 世纪 20 年代,史学界的一个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反对封建旧史学,建立现代史学体系。李大钊从多个渠道吸收、丰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对欧洲近世以来有益于唯物史观的进步思想和观点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运用它们来论述史学的基本问题,其思想资源显得比较多元。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撰著于抗战初期,其唯物史观的史学价值已受到广泛的认可和运用。翦伯赞起初设想运用马列主义写出一部翔实的中国社会史,以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真实样貌。由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时局险恶,这个计划无法完成。于是,他投入到发动群众进行抗战的宣传工作中。为了引导青年科学地认识中国历史,他参考已经完成的社会史初稿,撰写了《历史哲学教程》。因此,对于《历史哲学教程》的写作背景及目的,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历经了持续多年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一是全民族抗战的兴起。

社会史论战是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由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所引发,涉及的问题很多,诸如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即是说,它是因政治论争而引起,带有政治与学术紧密交织的特点。翦伯赞积极参加了社会史论战。在北平和天津,他以《三民半月刊》、《丰台旬刊》为阵地,发表了诸多论文,如《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关于“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

此外,翦伯赞与吕振羽合作,撰写了《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1913—1932)》下册(由吕振羽撰写上册),以及带有批评性的史学理论文章,如《历史科学中的观念论及其批判》、《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略论中国史研究》等。参与社会史论战,使翦伯赞很快成长为一位举足轻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史论战表明,中国的历史学者已经不再停留于理论接受阶段,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并达到运用的新阶段。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带有抗战时期史学著作常见的救亡色彩。在《序》中,翦伯赞一方面指出民族抗战的伟大意义,另一方面认为抗战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并清除潜藏于抗战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他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法西斯历史哲学,如“暴力论”、“唯意识论”等。他从哲学的高度批判“隐藏在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行动阵营中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等等有害倾向”以及当时流行的“暴力论”、“唯意志论”等法西斯的历史哲学。

社会史大论战引发的问题,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做更高层次的理论工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中国由此走向世界历史的前台。中华民族到底是衰亡还是复兴,此刻到了关键节点。《历史哲学教程》正是翦伯赞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姿态,怀着必胜的信念,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民族复兴伟大事业而做出的理论思考的结晶。它肩负着对唯物史观正本清源、提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专

①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01 页。

②参见:周励恒《一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史学观——“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之二》,《博览群书》2021 年第 2 期,第 28—34 页。

业理论以及宣传抗战、为中国抗战指明方向的双重使命。

## 二 二书之内容: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

《史学要论》和《历史哲学教程》在结构、内容方面各有自己的逻辑,下面通过表1来展示它们的内容。

表1 《史学要论》和《历史哲学教程》的逻辑结构对比简表

《史学要论》	《历史哲学教程》
一、什么是历史	一、绪论 (一)历史科学的任务 (二)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 (三)历史科学的阶级性
二、什么是历史学	二、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 (一)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 (二)关于历史发展诸阶段的几个问题 1、亚细亚的生产方法 2、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 3、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三)历史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发展
三、历史学的系统	三、历史的关联性 (一)怎样理解历史的关联性 (二)历史发展中诸阶段的相续性 (三)历史发展之外在诸矛盾及其影响作用 (四)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辩证的统一 (五)从历史的关联性认识历史之全面的发展
四、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	四、历史的实践性 (一)从神学、玄学到实验主义的批判 (二)史的唯物论者怎样认识这一问题 (三)作为历史实践前提的人类与自然 (四)是经济决定还是“理性”的体现 (五)历史的动因是人类的“意欲”吗 (六)历史哲学之反动的发展——从“道德论”到“暴力论”
五、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	五、历史的适应性 (一)下层基础与上层诸建筑之辩证的统一 (二)适应于先阶级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三)适应于奴隶所有者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四)适应于封建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五)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六)适应于目前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之上层建筑诸形态
六、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六、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 (一)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之提出及其展开 (二)社会形势的发展与历史的飞跃性 (三)“历史的怀疑主义者”与中国的古史 (四)对中国历史形势发展之各种不同的见解及其批判

从表1不难看出,《史学要论》以“史学”为中心进行论述,包括历史与历史学的区别和联系、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历史学的科学属性、历史学与相关学问的关系、历史学的功用诸内容,由内到外,层层论述,结构严谨。它通过区分历史与历史学的不同,论述了历史认识论及其特点。它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连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有生命的东西。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历史一旦发生,就不可能有任何变动了,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不断变化的。史观与关于历史的知识不断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因此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一切的历史,不但不怕随时改作,并且都要随时改作。改作的历史,比以前的必较近真。”<sup>①</sup>《史学要论》主张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它的系统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最广义的历史学;第二层次为历史哲学(应入哲学系统)、特殊历史学、普通历史学;第三层次是第二层的记述之部和理论之部。它从学科分类史的角度探讨了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揭示了历史学的基础性地位,最后以

①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03页。

感情奔放的笔调充分肯定了历史学对人生态度的积极影响。《史学要论》虽然非常简略,但格局宏大,涉及有关历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而《历史哲学教程》第一部分绪论属于狭义的史学理论范畴,即关于史学本身的理论,包括“历史科学的任务”、“历史科学之史的发展”、“历史科学的阶级性”;第二部分至第五部分论述历史理论,涉及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诸问题;第六部分是关于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历史理论问题。《历史哲学教程》的核心是“历史”,论述历史存在、历史发展的原理和法则。其中,所谓的“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就是指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它表现为历史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历史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的发展。翦伯赞指出:“历史发展的一般法则,虽然是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却包含着最复杂的现实内容。它是从几千年来各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环境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sup>①</sup>,历史的一般法则与历史的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历史的研究不仅是探求一般法则,而且是探求特殊形势;不仅要从小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象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所谓的“历史的关联性”,是指历史要素的相互联系,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而且这三个方面也是密切相关的,“在历史之纵的发展中,同时也就包含着横的发展,历史之纵的发展与横的发展之相互的统一,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相互的作用与统一种种,构成具体历史的客观的全面”<sup>②</sup>。所谓的“历史的实践性”,是指历史是过去全人类生活斗争与其创造之实践的成果。他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上所存在过的一切社会,不管古代的,封建的,以及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只能作为人类在其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生产及交换关系之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由人类预先设定了的一种‘绝对理性’之实现”<sup>③</sup>。所谓“历史的适应性”,是指社会下层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的统一,也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内容都属于李大钊所列历史学系统第二层次中的“历史哲学”。最后,“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既是对持续数年的社会史论战的总结,也是本书论述历史发展基本原理的归宿和落脚点。也就是说,《历史哲学教程》论述的主体是历史本身的理论问题,这与李大钊以“史学”为中心迥然有别。

当然,李大钊《史学要论》论述史学,并不是完全不讲历史本体论,如在第一部分“什么是历史”中,李大钊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历史的运动,指出:“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譬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与上层;社会的基址,便是经济的构造——即是经济关系——马克思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社会的存在;社会的上层,便是法制,政治,宗教,伦理,哲学,艺术等,马克思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基址有了变动,上层亦跟着变动,去适应他们的基址。……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sup>④</sup>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论述历史本体,也不是完全不涉及史学。它的绪论部分,以及正文中对神学、玄学、实验主义的批判,对社会史大论战出现的各家学说的批评,都属于史学的范畴。但二书内容侧重点不同,则是显而易见的。

李大钊《史学要论》还带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的粗放的特点,有些概念尚未定型,难以做到精确。如对唯物史观的称谓,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又称经济的历史观。”在此前发表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他列举了“唯物史观”的四种表达“名称”: (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 (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他认为,“比较起来,还是‘经济史观’一辞妥当些”<sup>⑤</sup>。在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论述中,他反复说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对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反作用极少论及。强调历史发展变化的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正确的,但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②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76页。

③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105页。

④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9页。

⑤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44页。

把唯物史观与经济史观等同,就有犯经济决定论的机械主义错误之嫌。而这一点恰是社会史大论战时期暴露出来的理论缺陷,是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不断批评的。《历史哲学教程》中的第五章“历史的适应性”,就是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它不仅与《史学要论》一样反对历史唯心论,更是在此基础上反对机械论,强调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很显然,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比《史学要论》前进了一步。

在论证方式上,《史学要论》是在纯学理的层面进行的由理论到理论的逻辑运用;而《历史哲学教程》则是将理论和历史紧密结合,或从历史的角度说明理论,或从理论出发论证历史,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真正融入到历史事实叙述中,用历史学的范畴构建起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框架和模式。在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结合上,《历史哲学教程》也向前推进了。

在对历史学功用的认识上,《史学要论》从史学陶炼人的科学素养和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进行立论,对其经世致用的作用反而忽略不谈。这大概与现代史学建立初期批判封建史学强调历史的鉴戒功能有关。而《历史哲学教程》则强调了历史学的社会作用,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着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sup>①</sup>,这就在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致用性的统一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史学要论》建立的史学理论框架更加宏观,对古今中外有益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表现出宽阔的胸襟、平等对待和积极吸纳的态度,纯学术著作的气质比较浓重;《历史哲学教程》表现出的战斗个性和批判色彩比较强烈,抨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强调历史科学的阶级性,服务于抗战的著述宗旨非常明确。《史学要论》在与国际学术接轨、逾越现实局限方面又是《历史哲学教程》所不及的,具有超越时代的更强的生命力。

从学术关联看,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与李达的《史学要论》,虽同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但二者并没有承继关系。《历史哲学教程》没有提到李大钊及其《史学要论》。然而,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纵向发展的角度看,二者又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历史哲学教程》在《史学要论》的框架内充实了历史本体论、历史研究法的内容,充分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积极参与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实践性品格。《历史哲学教程》经社会史论战孕育,由抗战时局助产,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 三 二书之影响:在曲折中闪光

《史学要论》是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第51种出版的,代表了一种新的史学方向,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sup>②</sup>。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31周年的纪念文章中,把聘请李大钊、陈翰笙、李璜等到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的举措视为北大史学系几个重要的“可纪之事”之一<sup>③</sup>。

20世纪30年代,史学理论著作大量出版,书名有“史学概论”、“史学通论”、“史学概要”、“历史学ABC”、“史之梯”等。《史学要论》所创立的理论框架,多被这些著作所效法。李大钊给“历史”、“历史学”所下的定义,被广泛引用。李大钊所论述的史学与相关学问的关系、史学对人生态度的影响,受到重视和参考。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受《史学要论》的影响也很明显。如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中将历史区分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和“人类过去活动的记载”<sup>④</sup>,显然是借鉴了李大钊的观点。何炳松的学生卢绍稷撰写的《史学概要》引用了李大钊对史学的定义。郑鹤声为中央大学史学系编写的《史学通论》,在“史学释”中论述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法的区别时也借鉴了《史学要论》,引用了李大钊的一些说法。

1930年春,共产党员杨伯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次年,该书店发行《二十世纪》杂志,以“科学”、“批判”、“综合”的宗旨阐释学术思想,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周绍张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论历史学》,文中对历史的定义、历史的科学性以及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关系的阐述,都运用了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所论述的观点。此外,辛垦书店编译人员刘静白还出版了《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一书,将李大钊与何炳

①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全集》第6卷,第35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49页。

③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④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0页。

松进行对比,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给予了称赞和宣传。他在该书《绪论》中说:“李守常倒底是新一世纪底人,而且又受过进步思想底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示出优越性来。”<sup>①</sup>

李大钊 1927 年被北洋军阀杀害以后,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他的著作被禁止出版<sup>②</sup>。这严重限制了史学理论的传播。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重视李大钊史学成果的学者并不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大钊的史学地位亦长期不彰。史学界真正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给予重视,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那时,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再次走向正轨,《史学要论》的价值受到瞩目。从 80 年代以来发表的众多的史学理论文章、出版的史学理论著作到现今的“马工程”教材,都对李大钊的史学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极其珍视并吸收《史学要论》中的学术观点。“马工程”教材《史学概论》(第 2 版)评论说:“1924 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了对史学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学科体系认识的奠基之作。”<sup>③</sup>

《历史哲学教程》1938 年甫一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在出版地长沙及其他分销处很快售罄。第二年,翦伯赞在新知书店的要求下增加了一篇“再版代序”,再次出版,依然受到欢迎,学界对它更是好评如潮。《新知十日刊》、《上海周报》、《现实》等报刊多次刊登对它的评论。《上海周报》的一篇书评说,翦伯赞的著作具有深刻的战斗性,揭露了某些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穿上经济唯物论和观念论的外套,戴上深度的老光眼镜,拼死地否定这一历史真理,他们对人类社会发过程之历史的理解,只能局限于其自身所隶属的阶级意识的界限内,丝毫不能给与历史以真实科学的认识”,这些御用历史家的史学观歪曲历史事实,割裂历史的全面性,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历史哲学教程》传达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深切了解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究竟”,“给与每个被压迫劳动人们去接受历史的领导指示”<sup>④</sup>。在写作方法上,有评论者认为,《历史哲学教程》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具体的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在说明原理的时候,列举了西洋史和中国史的例子,作反批判时候亦然,但好处不在‘列举’而在说明得亲切有味,干脆爽快,深具中国三昧”<sup>⑤</sup>。

《历史哲学教程》所表现的战斗豪情,使读者精神振奋,特别是对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极具吸引力,很多人以先睹为快。然而,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阐释却引起了国民党宣传部门的恐慌。为了应对出版审查,尽管作者在“再版代序”中违心地把蒋介石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一并写进了“伟大的民族革命领袖”之列,以收“障眼法”之效,但仍然遭到查禁。当时的湖南省政府秘书长潘公展下令,此书不准再版、翻印和销售,现存的销毁。尽管如此,《历史哲学教程》1946、1947、1949 年在上海、重庆、长春等地还是被多次重印,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仍然重视史学理论建设,对历史主义理论多有阐发,一定意义上修正和完善了《历史哲学教程》中的某些偏颇观点。侯外庐说:“翦伯赞同志一贯注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建设,尤其注重史学方法论的探讨。他在抗战初期所写的《历史哲学教程》,就是一本探讨历史理论和方法的专著。”<sup>⑥</sup>可悲的是,当年为应出版检查,1939 年再版本中所写下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在中国便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领袖蒋介石”一句,尽管在 40 年代的重印本中已被删除,但到“文革”时还是被人翻出来作为一项“罪证”,使翦伯赞为此受到迫害。1990 年 11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经过翦伯赞学生施德福、张传玺校勘的校订本,《历史哲学教程》方得普及,并被认为是最能反映翦伯赞学术贡献的著作而入选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 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系列丛书之一。

#### 四 余论:一个有待完善的学术系谱

当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系谱中,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是第一代马克思主

① 刘静白《绪论》,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 1933 年版,第 16—17 页。

② 20 世纪 30 年代,李大钊的部分著作由其亲属编辑,请鲁迅作序,试图出版,但没有成功。鲁迅的序《〈守常全集〉题记》一文写于 1933 年 5 月 29 日,发表于 1933 年 8 月 19 日出版的《涛声》第 2 卷第 31 期,其中写道:“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见:《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40 页。

③ 《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第 2 版,第 77 页。

④ 子婴《介绍〈历史哲学教程〉》,《上海周报》1941 年第 3 卷第 17 期,第 454 页。

⑤ 方兴《〈历史哲学〉与〈历史哲学教程〉》,《新知半月刊》1939 年第 3 卷第 4 期,第 32 页。

⑥ 侯外庐《学习翦伯赞同志的求新求实精神》,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 页。

义史学家几成定论。下面举出的两位代表性人物的论断即可说明这一点。一位是周扬，一位是刘大年。周扬说：“翦伯赞同志，还有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等同志，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历史的一批学者。他们是拓荒者、开路人。”<sup>①</sup>刘大年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学上最富于革命性、开创性的革新派。他们的先贤是五六十年代人们所说的以郭沫若为首的‘五老’。翦伯赞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并为‘五老’之一。我曾说过，外庐去世，宣告了中国最早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活动的终结。”<sup>②</sup>周扬是长期负责我国文教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前副部长，刘大年是继范文澜之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多年协助郭沫若、范文澜在科学院系统的行政工作。上引虽然是他们的个人观点，却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说“五大家”是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那么李大钊的地位应置于何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考察五大家与李大钊的关系。在五大家中，郭沫若比李大钊小3岁。郭沫若与李大钊一样，有留学日本的背景，比李大钊晚去日本一年，他们都是最早在日本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接触的环境和路径非常相似。在郭沫若的著作中，似乎没有提到李大钊。范文澜比李大钊小4岁，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至1917年在北京大学读本科。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工作时，范文澜已从北京大学毕业，并做过短期的蔡元培的私人秘书，与李大钊并不相识。范文澜后来辗转到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正欲前往北京会见李大钊，但未及成行，李大钊即已被捕。1933年，范文澜参加了李大钊的葬礼<sup>③</sup>。1949年，范文澜与王南合作发表《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一文，文中表彰了李大钊的进步历史观以及史学功用观。翦伯赞比李大钊小9岁，应该见过李大钊，但未必相识。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领导的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活动，翦伯赞也参加了。李大钊曾在天安门举行的示威大会上发表讲话，后来军警开枪射杀请愿群众，死伤数十人，是为“三一八”惨案。在这次事件中，李大钊受伤，遭到通缉，此后转入地下活动；翦伯赞则是帽子被子弹打穿，所幸没有击中头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翦伯赞对高等学校历史教材建设付出了巨大精力。在1961年召开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翦伯赞被任命为历史专业教材编审组组长。之后，他推荐吴泽担任中国史学史近现代部分的主编，并亲自组织了一次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座谈讨论。他在座谈会上阐述了写史学史的必要性，认为写现代史学史，要写李大钊，因为他“写了六篇史学文章”。田珏认为，写现代史学史，“提人，郭老要提，范老也要提。郭老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范老、吕老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写通史的”<sup>④</sup>。吕振羽比李大钊小11岁，他的著作谈到李大钊的地方也很少，但他晚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课，说到史学史时提及李大钊：“现在要写史学史，北大和其他大学有一些年轻教师问我怎么写？我说：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史，首先要写李大钊同志，但自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的。”<sup>⑤</sup>吕振羽对郭沫若、范文澜是很尊重的，1962年，他在家乡高校的座谈中谦虚地说：“我还要声明，我不是什么家，更不是什么权威。我没有很好地搞过历史研究，我是一面搞党的工作，一面搞点历史的。只有郭老（沫若）、范老（文澜），他们才是专家，才是权威。”<sup>⑥</sup>侯外庐比李大钊小14岁，他与李大钊有直接的交往。侯外庐1924年在北京求学期间，经同乡高君宇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在学业和思想上，侯外庐受到李大钊的指导，还曾向李大钊借钱创办进步刊物《下层》。侯外庐以后赴法留学，刻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资本论》，李大钊的鼓励是原因之一<sup>⑦</sup>。

从上述五大家与李大钊的关系来看，除了侯外庐以学生的身份与李大钊有直接的接触外，其他四位与李大钊并没有交往。对李大钊的史学贡献，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给予了肯定，翦、吕甚至从学科史的高度认

①周扬《追求真理 勇于探索》，《翦伯赞纪念文集》编委会编《翦伯赞纪念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②刘大年《革新派先贤祠中的一员》，《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214页。

③范文澜《李大钊同志永远不死》，《新中华报》1941年4月27日，第6版。

④田珏《开风气之先的史学家——怀念翦老》，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第167页。

⑤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⑥吕振羽《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吕振羽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1页。

⑦参见：侯外庐《初的追求》，张岂之主编《侯外庐著作与思想研究》第1卷，长春出版社2016年，第10—14页。



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首先要写李大钊,但均语焉不详,而把郭沫若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看得更加重要。这就无意中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用淡化了,使李大钊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脱了节。

李大钊的史学著述,在民国时期对五大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五大家对李大钊的史学成就亦缺乏专门的研究。这是他们对李大钊史学地位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前,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没有引起学科建设的应有重视,除了因为形势的需要,开展了一些个案研究,对辛亥革命以后史学发展的系统认识比较薄弱。而在个案研究中,李大钊研究又没有真正开展。这就导致了在相当长时间内,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系谱中的缺位。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李大钊进行深入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诚如马工程《史学概论》(第2版)所评论的一样:“李大钊的史学观以及他所提出的这一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影响尤为突出。当时面世的一些史学概论教材,有的就是对《史学要论》的阐发。”<sup>①</sup>特别是随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李大钊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日益被发现。著名史学史专家白寿彝先生曾多次强调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用,指出:“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sup>②</sup>白寿彝先生的论断,是从文本出发做出的,是建立在史学史纵向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的,与周扬、刘大年的论断相比较,站位更高,更加严谨、准确。

史学理论关乎整个史学的发展方向。李大钊的史学理论著述,为中国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系谱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李大钊都应被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

##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ZHOU Li-heng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History,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s *History Essentials* and Jian Bozan's *A Course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are two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us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status. *History Essentials* was published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while *A Course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came out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 great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ue to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the writing era an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the two work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evolution from *History Essentials* to *A Course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reflects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from founding to completion, from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o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y Essentials*; *A Course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Li Dazhao; Jian Bozan

[责任编辑:凌兴珍]

①《史学概论》编写组《史学概论》,第109页。

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